

茶座

总第二十九辑 2012 第三辑

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王学典

历史学家茶座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孔强生：“飞虎队”口述历史：李继贤访谈

千里：李珽先生在“文革”中（四）

陈高华：北大五年（1955～1960年）

苏双碧：我在北京历史学会和下乡搞“四清”

刘 婷：顾颉刚与他生命中的四位女性

董立功：也谈胡适的“战犯”头衔

散 木：李劫人书信中的四川“大饥荒”（上）

谷晓晖：陈建中与中六组





TEAHOUSE FOR HISTORIANS XXVIII | 历史学家茶座29

主 编：王兆成

执行主编：王学典

学术助理：陈 峰 绍 樱

编委会：

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
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
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
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
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历史学家茶座. 第29辑 / 王兆成主编

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社，2012.12

ISBN 978-7-209-06626-6

I . 历 ... II . 王 ... III . 史学—丛刊 IV . K107-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175979号

责任编辑 王海涛

封面设计 李海峰

版式设计 谢润萌

山东出版集团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网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编辑部电话 0531-82098014

购书电话 0531-82098021

邮局邮发代号 24-50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16开本（172×232毫米）10印张 160千字

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14.00元

（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单位调换 电话：0539-2925659）

史学理论研究路向再反思

王学典

近30年来，史学思想领域一个基本走向是：告别“历史理论”，走向“史学理论”。换句话说，“历史认识论”取代了“历史本体论”，是近30年来史学思想研究的基本特征。这一研究取向的出现并占主流地位，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：史学自我意识的增强，用“历史观”代替“史学理论”局面的终结。从此，“史学理论”作为一个学科逐步发展起来了。但与此同时，偏向也出现了。

把历史理论、历史观打入冷宫，放弃或排斥对社会历史进程本身的思考，是这一偏向的集中体现。本来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人们提出将“历史理论”与“史学理论”加以切割，意在纠偏，是提醒人们留意和关注史学本身的问题，如历史认识论等等。但随之而来的，却是大家对史学理论的“学科建设”的关注，越来越超越了对历史学基本任务的关注，更超越了对历史本身、历史巨变的关注。人们把“历史理论”和“史学理论”加以分隔，似乎是为了主动地把“历史理论”的探讨和研究拱手放弃，而好像只有在所谓“史学理论”领域里耕耘才是自己的本分，“史学理论”的研究遂越来越变成一小部分学者的孤芳自赏，于是，这种研究越来越被边缘化。“史学理论”研究在放逐了时代之后，其自身也被时代所放逐。

“史学理论”研究毫无疑问有自身独特的价值，但就像月亮离开了太阳就不会发光一样，“史学理论”必须植根于“历史理论”，其本质上是隶属于“历史理论”的，最终是为了说明历史本身的。个别研究者可以终身以“史学理论”研究为限，但整个学科却不能孤立于对历史本身的研究之外。“史学理论”研究者当前应该重建自己与中国社会巨变这一宏大背景之间的联系，再度调整自己的方向，从历史认识论重返历史本体论，从“史学理论”重返“历史理论”，重新把自己置身于历史进程中来。

目 录

卷首语

003 王学典 史学理论研究路向再反思

历史现场

007 孔强生访问整理 “飞虎队”口述历史：李继贤访谈

026 杨倩如整理 冉昭德日记（三）

学坛述往

039 陈高华 北大五年（1955～1960年）

054 千里 李埏先生在“文革”中（四）

065 苏双碧 我在北京历史学会和下乡搞“四清”

重读民国史

075 张家康 另一个汪精卫

086 肖晓飞 伪满洲国的幕后操纵者

人物春秋

- 093 刘 婷 顾颉刚与他生命中的四位女性
111 王 蕾 伊人独憔悴——徐志摩的“元配”夫人张幼仪

史论沙龙

- 120 步国荣 专业之外的无知与偏见——20 世纪 70 年代留美中国学者访华言论

旧案重审

- 126 董立功 也谈胡适的“战犯”头衔

公私档案

- 131 谷晓晖 陈建中与中六组
135 散 木 李劫人书信中的四川“大饥荒”（上）

掌故钩沉

- 151 王丹誉 中国古代的“另类官场”
157 陈占彪 “外交儿戏”两种



“飞虎队”口述历史：李继贤访谈

孔强生 访问整理

前 言

李继贤，1913年出生，江苏阜宁县三泓（现属滨海县）人。1940年陆军军官学校十五期一总队步科毕业，留校任十八期教练班长，不久转任空军军士学校二期、三期区队长。1943年考入空军军官学校十六期第七批，留美受训，1944年底回国参战，加入中美空军混合团五大队第二十六中队，驻湖南芷江，曾参与湘西会战等役，至抗战胜利，共参加作战任务52次。

中美空军混合团（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，简称CACW，或称中美联队），由两个驱逐大队（第三、第五大队）和一个轰炸大队（第一大队）组成。当时欧洲和太平洋战事正酣，美军飞行员短缺，而中国飞机等装备不足，时辖美第十四航空队的陈纳德因此建议，中美双方组成空军混合团，属中国空军，由陈纳德节制，指挥人员由司令至分队长，都由中美双方各派一人组成。混合团1943年10月正式成立，至抗战胜利止。中美双方混成一体，合作无间，联手抗日，战果彪炳。

本篇为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混合团访问项目的一部分，据2006年1月和5月、2010年12月、2011年8月在台北李先生寓所的访问整理而成。文内小标题和附注均为整理者所加。照片除注明者外，均由李先生提供。李先生的公子世京先生协助联系，梁丽桃、陈汉颖、叶锦花同学协助整

理部分录音，马文昌先生提供成都士校照片，感谢潘忆蓉小姐协助复印部分资料。在此一并表示谢意。

家庭概况

我民国二年（1913）12月（阴历11月）出生，是江苏阜宁县人。那时候的阜宁县，现在已经改成阜宁、滨海、射阳三个县。我家乡靠海边，现属滨海，附近黄河入海处有个龙王庙，现在已经倒了。

我出生在老家三泓，后来家在沈家滩，离三泓约有一天的路。务农为生，家境小康。有一个哥哥、两个姐姐、一个妹妹。大概七八岁的时候，父母请了个私塾先生，来我家教我们念书。

不久土匪闹到沈家滩，有一次都到了我们家门口外的麦田，结果被我父亲发现，用打野鸭子的很长的大土枪打了两枪，把他们吓跑了。王家滩是一个很大的村庄，居民都是姓王的，我舅舅家是那里的地主。正好我三舅赌博输了钱，就来找我母亲，说既然沈家滩闹土匪，不如我们用所有的现大洋给他还债，他分给我们十几二十亩地。我母亲被说动了，我们就搬到了王家滩西大街舅舅家住。我家开支大，这些地怎么够？结果家道中落，有一年荒年，都没有饭吃了。

我在王家滩小学读到四年级，那是我的一个表哥办的，是个初小，那时候读书困难得很。毕业后到了三泓小学，一个有六年级的完全小学。我家是个大家庭，大伯父和二、三伯父都还在三泓，就住在他们家里。初中在家乡念县立的阜宁县中，后来就出来到南通一个市立学校读高中一年级，那个时候我父母、兄嫂都还在。高一没上多久，就爆发了七七事变。

陆军军校

七七事变后，因为打仗了，到处流亡的学生不能读书，读军校是那时候最好的出路，毕业以后打日本鬼子、保卫国家是我们最大的愿望。我也报考了军校，弃学从军。报考军校是有年龄限制的，要求十八岁到二十二、三岁，我刚好符合要求。考试的时候是高中同等学力一起考，能考上就考，考不上

也考。那时候我们家乡很多人在中央军校，十三期就考上很多人，我过去的那些小学同学有的也考上了。

我考了两次军校。第一次在南京考十四期，那次参加初试的人起码有好几千个人，就录取到名额满为止，其余的就不要了。录取后就放榜，公布名字。我初试被录取了，说要进十四期二总队。不久军校搬到武昌，我在武昌复试，落榜了。

那个时候抗战已全面爆发，很需要人。共产党也是如此，你愿去就给路费，一站一站送你到延安去，还有人找过我。学校因此成立了一个学兵连，把复试落榜的领来报到。军校原来有个练习营，负责军校四周警卫和站岗，营长是徐昆，是张治中的人，长沙大火后被枪毙了，真可惜啊。这时就把练习营的第一连改为学兵连，收容我们。所谓的学兵连就是军校派教官补习数理化，上政治课。我们在武昌听了几个月，然后再参加十五期的考试，我考上了。当时我们有一百多人，只录取了约五十多人，剩下的五十多人后来又参加考试，被十六期录取了。

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年底，我考入军校并报到，进了十五期一总队。十五期不止一个总队，本校是一总队，西安等各个分校都有总队。我们在武昌入伍，然后撤退到宜昌。在宜昌训练大概两个月，坐船到四川重庆。在璧山又训练几个月，再穿草鞋走了一个多月，行军到了成都。

一总队开始有十二个中队，并不分步骑炮工辎，一起训练。到了成都就来一个笔试，按意愿开始分科：步兵正式的有两个大队，每个大队三个中队，一个中队有三个区队，一个区队三个班。炮科有三个中队，工兵三个中队，骑兵一个中队，辎重一个中队，通信一个中队。另外空军官校十二期约三百人，也在我们军校十五期代训，属步三大队，代训几个月就走了。

我被分到步科，属步二大队第六中队第二区队第六班，还是排头，扛机关枪的。第四班排头叫张衷，在云林。第五班排头叫董维五，在厦门大学当教授。现在他们都过世了。在我们同学里头我是年纪最大的。我们还接受迫击炮训练。迫击炮后面有个后座，架起来放炮弹，抛射出去很准的。

那时国家穷，军校苦不堪言。学生穿草鞋，一个月才发几块钱，就星期

天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出去打个牙祭。但士气很高，苦一点没关系。

我们十五期正期生有一千五百多人，受训两年八个月，到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）七月二十一日在成都毕业了。老总统参加了我们的毕业典礼，还一个个点名。加上空军官校十二期，还有辋重学校代训的，十五期一共有 一千九百多人。

空军士校

毕业以后，大家都力争到前线打仗，我们同队的牺牲了很多，衡阳会战就阵亡了十几个，会战中打死了日军师团长的白天霖是我们十五期炮科的。那时候熟的部队会寄来旅费，我没有认识的兄弟部队，所以没有办法去。分发时，我说随便到哪里都可以，学校看到我没地方去，就把我留下了。那时



成都太平寺空军士校正门 马志成（士校二期毕业）摄 马文昌藏

候留校的有六百多人，军校还要训练人的。

我留在学校当了十八期一总队的教练班长，十八期在成都草堂祠那里受训。那个时候四川军阀潘文华、刘文辉、邓锡侯这一帮人把米囤积起来，囤积居奇。我们十五期还好，到了十八期就不行了，买不到米，没有东西吃。吃饭时六个人蹲在地上吃，中间一个饭桶，一大盆空心菜，一个人分饭。当时已经开始通货膨胀了，我毕业后是少尉，一个月四十几块钱，还不够吃饭的。

开学没有多久，后一个区队长，叫白良璧，东北人，第九期毕业的，和空军五期的雍沛是同学，去了空军军士学校第二队当副队长（抗战军兴后，飞行员伤亡很大，故在成都设立空军军士学校，降低空军官校高中的投考资格为初中，以补人员之不足）。他说：“那边少个区队长，你来不来？”我说我去，就请调去了那边当上尉区队长。空军士校吃空勤伙食，比陆军好多了。

当时的空军士校是在成都的太平寺。士校跟航委会的官校都是教授飞行的，但士校情况比较特殊，原来是训练士官的，而官校是训练军官。后来士校和官校合并了，士校变成官校特班，士校就跟官校一样了，没有什么大的差别。士校二期的就变成空军官校十二期特班，三期是十三期特班，第四、第五期是十五期、十九期特班。空军士校的人后来还当了中将。

我当了空军士校二期区队长，又当三期区队长。当区队长就是管理他们的生活，他们上机场飞行，我都要带他们来去。后来的四、五、六期因为中国缺少汽油，都到美国受训。

空军官校

记得是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），我在士官学校两年多后，就放弃了上尉区队长的职位，重新去报考空军官校当学生。

我决定投考空军有几个原因：日本鬼子野蛮无理，侵略我们中国，我恨之入骨，想请缨到部队去作战，但没有部队可去，只好在军校训练学生。我们陆军不大行，空军是打日本鬼子的最前线。

另外，那时候重庆大轰炸，成都也被滥炸。有一天，一百零八架日本飞机飞得高高的，把成都全炸了。另一次轰炸，军校防空疏散，学生就到处跑。

我去了军校的东校场，发现那里有一个小弹坑，有一个女人的大腿和高跟鞋还在那边，其余的都不见了，碎肉都挂在了树上。我当时就有了参加空军，开飞机打日本鬼子去的志向和愿望。结果糊里糊涂地考上了空军，打日本鬼子打得真痛快！

正好那时候空军官校因为身体要求严格，招不到学生。我在空军士校，星期六放假出去玩，就顺便到成都城里招生办事处，找认识的空军士校的牛医官聊天。牛医官也是招生委员会的航空医官。他说：“没有几个人来检查的。”我开玩笑地说：“你给我检查检查吧。”他说：“好啊，好啊。”初试就通过了，体格还很好。复试时他说：“你血压有点高，休息一下再来。”于是我休息了一下，再去复试第二次时，就顺利通过了。过关以后，第二天就笔试，那次笔试大概有六、七十人参加，只录取了十个左右。笔试通过以后，第三天航委会就派卡车把我们先送到泸州，再坐船到宜宾机场报到。

那时候我们十六期第一批到宜宾的，约一百二十个同学已经开始练习飞行了，我们第二批到，各处来的一共有八十多人。到了那边没有事做，就搬搬石子，修修机场的路。住得也不好，没有被子，都是稻草。第一批的人跟我们讲：“根据和美国的合同，我们应该是最后一批去美国受训的。你们恐怕要到印度。”我们说：“到印度受训也一样啊。”结果我们这八十多个人到了印度，之后反倒先去了美国受训，成为到美国的第七批，是十六期第一班。他们先到宜宾的，因为汽油供给不上停飞了，反而是到美国的第八批，变成了十六期第二班。然后是第九批，以后是特班去美国受训。

印度受训

我们这批八十多人在宜宾呆了大概十天后，上面有命令，就坐三辆卡车到了昆明。昆明待了十天，办好了出国手续，就马上坐飞机，到了印度腊河（现译拉合尔，今属巴基斯坦，为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和旁遮普邦首府）。腊河现在属巴基斯坦，有个机场。我们到那里报到了以后，飞机场有了，教官有了，飞机也有了，就开始在那儿练习飞行。当时没有做什么地面训练，那时战事吃紧，我们空军人员接济不上，很需要人。



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）摄在腊河初级班受训时。前左一为王福生，前左二为姚兆华（马来西亚侨），后左一为李先生，后左二为教官邓继华，后左三为牛荣贵

我们练习用 PT-17，双翼的小教练机，教官都是中国人。我们飞了三个月，最后经过美国教官三次考试才算及格，才能去美国。去美国学飞行的有六十几个，在那里又淘汰了很多。停飞的就改学航炸、机械。

我们离开了腊河，接着空军十六期第二班在那儿受训，然后一期一期，一直到二十四、二十五期还在腊河，以后的各期因抗战胜利了，没再去腊河和美国。

我在印度时突然“打摆子”（疟疾，俗称打摆子，症状为忽冷忽热），但是不敢到英国医院去看，害怕如果医院医生要求留院隔离治疗，不让回来就糟糕了，就还照样飞，继续训练。当时真的很苦，英国人给我们吃的只有什么牛奶啊，红茶啊，cheese（奶酪），牛肉罐头，两块面包。面包都是硬的，我不能吃，就自己找点白米，做点稀饭，弄点小菜吃。我“打摆子”嘴唇不

时发搔，有时就忍，有时就抓，结起了血块。飞行的时候，那飞机没有装舱盖，风大，把血块吹扯掉，下来一嘴是血。

那里的床是网床，用绳子把那底下系起来，给两条毛毯子，一个蚊帐，人就铺着毯子睡觉。印度热得很，我睡不着觉，就把那毯子用水龙头弄湿了再铺上，才能睡着。后来接受体格检查，我仅仅四十多公斤，医官说差一点就不能合格。那三个月真的很艰苦，能够活过来已经不错了。

在腊河令我很生气的是，我们有一个刚回国的中国小教官偏心，把我整惨了。他是空军官校十二期的，十二期在军校代训的时候，和我们十五期正科生相处得不好，与我们不和。空军是亡命之徒，他们优越感很强，不守军纪，到处和人打架。常常足球、篮球比赛输了就和我们打。他们才三百多人，我们有一千五百多人，怎么打得过我们呢？那教官问我：“你是哪一期哪一队的？”我说：“是十五期一总队的。”他就整我，想把我淘汰。我可不干，他上课一打驾驶杆，我就不上去飞了。他回来落地就罚我站跑道旁边指示风向的T字布，我就忍。

我人缘很好，我们队长、区队长比他级别高，指导员是个广东人，都对我很好。我这人不大吭声，不大讲话，结果他也没有办法。放单飞的时候，我们五期的主任教官陈鸿福考试，考了五六个人，就我一个放单飞，其余的都停飞了。他带的那一组只有两个学生，一个是我，另一个四川同学，是他最喜欢的，却在美国飞战斗机的时候被淘汰了。这飞行也是个命啊。

在美受训

在印度飞了三个月，通过了美国教官的考试，然后我们作为留美第七批，到美国受训。先到孟买坐两万多吨的船，经过印度洋，到了南非。在南非住了三天，再经大西洋，然后到纽约。在纽约那里吃了顿饭，然后上火车，前去凤凰城（Phoenix）。凤凰城是沙漠地带，不过美国还好，再热也有冷气。

我们到那里的Williams（威廉斯）机场后，先上了两个月的ground school（地面训练）。然后就在Thunderbird（雷鸟）机场上两个月初级班，还是飞PT-17。然后转到Marana（马瑞拿）机场上中级班，到那里飞那种美国教官叫作

联合 BT — 13 的机型。中级班也训练了两个月，就到 Luke（鹿克）机场升高级班（上述各机场均在亚利桑那州南部），飞 AT-6。初级班、中级班、高级班都是两个月，高级班毕业就在 Luke 参加 OTU（Operation Training Unit，作战训练分队），飞 P-40 战斗机，飞了三个月，不到 100 小时就毕业了。接着就回国参加作战。

在美国受训的时候课程安排很紧，每天都很忙。一天要飞三四个小时，还要上地面学科，教官讲动作，还要飞林克机（Link Trainer）。我们一般是上午飞行，下午学课，有时下午也有飞行。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没事了。

在美国我几乎一直都是学生队长，叫口令，领学生上机场、出操、吃饭。我每天都是六点多钟起床，然后在美国餐厅吃公家付钱的早点。我们那班学生一共二十几人，结果每天就只有我一个人去吃早点，他们因为起不来，每次都去。集合到机场去的时间到了，还有人睡在床上不动，把他们的毯子拉下来，人叫起来，就糊里糊涂地跟着走了。

我们主要是美国教官教。初级班是美国教官，中级班、高级班有中国教官，战斗机训练都是美国教官。我们留下在学校当教官的很多，每一期都会留下几个。美国教官上课的时候有翻译官，我们听不懂就问翻译官。

初级班很要紧，将来飞得出来飞不出来就看初级班。初级班的教官不是军人，而是普通百姓，但飞行很好，由美国政府雇用，替他们训练。中级班以上都是正式军人。我们编队飞的时候一般是四架飞机一起飞，你对我、我对你打，演练实战。

我们在美国受训的时候，除了中国人、美国人，没有看到其他国家的人。平时来往主要的是中国学生，还有我们的翻译官和领队杨绍廉。杨绍廉是四期的，后来曾任空军副总司令。还有华侨请我们吃饭、送东西。那个时候华侨在美国还是很受歧视，有些地方像公园还不让他们进去。中美联合抗战，我们一去，他们就获得了平等待遇，抬起头来了。

在高级班的时候，我摔了架 P-40，摔得有点冤枉，幸亏人没摔死。那天我们跟了一个外国教官，他领队，我是二号机，在一个辅助机场落地。那机场是三角形的，我落地以后，飞机偏出一点点，出了跑道。我就加点油门，

再回到跑道上。跑道是柏油的，旁边是土地，一加油门，泥土都吹起来了，看不大清楚前方。我另外一个同学是三号机，美国通信官就讲：下滑的飞机，“Shift under approach, give them a go around”。叫我那同学加油门走。我那同学大概糊里糊涂地没听到，还继续下滑落地，但我还在跑道上啊。结果我那个领队就拿起话筒：“加油门走！加油门走！”他不说清楚要“下滑的飞机”加油门走，这么一讲，我就听他的话加油门走了。那辅助机场的跑道短，前后都是铁丝网，我一看快到铁丝网了，就带一下杆，飞机起来了，但速度不够，就栽下去了。飞机的发动机、螺旋桨都摔得裂开了，但我人没事，就头碰了一下。意外之后，我停飞了一阵子，那个美国教官要我考试，及格了才放我单飞。

我是民国三十三年（1944）4月15号高级班毕业的，是1944年D班。班级由A到E，是由高到低。毕业的时候举行了一个正式的毕业典礼，和美国的学生一起参加。他们二十几个女兵在排头，我们就在后边，再后边是我们同班的美国学生。

从美国到芷江

毕业后我们就分头回来参加作战。我们六十多个人到美国，一些飞轰炸机，一些被淘汰了。竺培风是委员长的外甥，英国剑桥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，原在驻美采购组，但他请求加入了空军。初级和中级班时和我们是同学，高级学了轰炸。

飞驱逐的有二十三个人。后来有十个人被临时叫去飞双发动机的P-38，因意外死了几人，回国的其中一个戚荣春，后来做过空军副总司令。P-38也是驱逐机，但它有两个发动机，灵活一点，航程更远，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就是被P-38打下去的。

我们一起回来的有十三个同学，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最后一批，下一批回国的十六期第二班，到队后没出几次任务日本便投降了。从美国回来的情况是这样的：我们在美国洛杉矶上船，先经过澳洲。在墨尔本休息了三天，一个同学在岸上出车祸住了院，剩下我们十二个继续回国。因为德日有潜水艇，美国派六条驱逐舰在前面开路，两条在后面押阵，和四十多条装满物资的货